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救赎 ——从奥康纳到中国生态文明的辩证法实践

崔孔辉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DOI:10.61369/HASS.2026030022

摘 要 : 聚焦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救赎理论, 探讨从奥康纳到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辩证法逻辑。奥康纳通过“文化-自然辩证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提出双重矛盾理论, 但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局限。中国实践实现三重突破: 宇宙观上融合“天人合一”与“生命共同体”; 发展观上生成绿色生产力; 全球话语权上超越西方生态乌托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框架。中国方案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融合激活生态马克思主义,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能的新范式。

关 键 词 : 生态马克思主义; 文化救赎; 奥康纳; 中国生态文明

The Cultural Redemp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 From O'Connor to the Dialectical practice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i Konghui

School of Marxism,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 Focusing on the cultural redemption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we explore the dialectical logic from O'Connor to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O'Connor reconstruc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culture-nature dialectics" and proposed a theory of double contradictions, but it was limited by Western centralism. China has achieved three breakthroughs in practice: in terms of cosmology, it integrates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it generates green productivity; in terms of global discourse, it surpasses Western ecotopias and builds a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hinese plan activates ecological Marxis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with both theoret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Keywords : ecological Marxism; cultural redemption; O'Connor;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在于自然的文化断裂。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体系中, 自然不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有机伙伴, 而是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遭受系统性的掠夺与破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界视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1], 这种功利主义取向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奥康纳在此基础上提出, 资本积累不仅造成自然物质代谢断裂, 更通过文化意识形态重构自然认知, 将自然商品化、工具化的观念内化为社会主流价值^[2]。这种异化既表现为森林砍伐、水体污染等物质层面的生态危机, 也体现为人类与自然情感纽带的断裂, 最终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基。

一、奥康纳的救赎蓝图：文化-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一)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重构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深刻的生态维度的批判, 其核心在于揭示传统理论对“自然”与“文化”维度的忽视。奥康纳敏锐地指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自然”维度的缺失, 有着将“自然”边缘化的倾向, 这一理论特质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合理阐释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 在传统理论中被逐渐遗忘或置于边缘地位, 没有取得应有的位置, 其理论空场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视阈拓展到对自然与人类辩证关系的完整阐释上^[3]。

奥康纳认为, 自然并不是那种等着人类去开发的“死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内在规律、有完整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同样, 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而应该理解作为一种和自然、社会生产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生产性条件”。

作者简介: 崔孔辉 (2002.07-), 男, 汉族, 湖北江陵人, 硕士在读,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荆州,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正是这种批判，让历史唯物主义从单纯的经济决定论里走出来，开始全面考察自然、劳动和文化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奥康纳还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这些具体角度入手，重新构建了一个“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在他看来，生产力不光包括物质层面的东西，还得把自然自身的运作能力也算进去；生产关系也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还需要放在文化和自然这两个维度下重新理解。此外，他特别强调，自然不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它本身也是有内在价值的。这一点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很不一样——传统观点更多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强调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然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9]。

奥康纳这套关于生态重构的思路极具分量的。它不只是让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变得更丰富了，还换了个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跟自然生态之间到底是怎么相互影响的。同时，它也给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提供了更扎实的理论武器，能更清楚地看穿资本主义那套生产方式是怎么破坏自然的。

（二）双重矛盾理论与文化救赎路径

奥康纳提出的双重危机理论，其实是在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是必然会同时出现。而他用来解释如何走出这场困局的核心工具，叫做“文化—自然辩证法”。在《自然的理由》这本书里，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不仅要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说的那种生产过剩危机，更麻烦的是，它对自然条件的过度压榨，正在让整个生态系统走向崩溃。这两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把自然和文化都简化成了“生产性条件”，也就是说资本逻辑让它们变成了只为无限增值服务的工具。更进一步看，奥康纳认为，第二重矛盾的源头在于资本主义把自然和文化当成了“免费的生产条件”，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资本积累的逻辑去剥削它们。基于这套理论，他提出的核心思路是“文化救赎”。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说白了就是文化危机在自然层面的表现，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文化入手，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

奥康纳的理论首先改变了对自然与文化的理解方式。强调自然本身具有“自主运作性”，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条件”。文化也一样，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东西，它同样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自然和文化一起，构成了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通过揭示这种辩证关系，奥康纳打破了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之间那种简单的对立，为后来的生态修复奠定了哲学基础。辩证法帮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矛盾。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不仅靠技术手段去掠夺自然资源，还通过各种文化观念让人们觉得破坏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自然辩证法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共同造成的异化，这比单纯讲技术治理或者道德呼吁要深刻得多。奥康纳认为，要想解决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必须重建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他提出要通过“生产性正义”，实现对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生产中把生态成本算进去，同时在文化层面重新建立尊重自然的价值体系，推动整个社会朝着生态理性的方向转型。

（三）未竟的文明对话

尽管奥康纳的文化—自然辩证法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开

创性的理论框架，但其理论体系仍存在未竟的文明对话空间，这也构成了其局限性的重要体现。

奥康纳的理论分析主要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基础之上，对于东方传统中关于生态的思想，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使得他在面对不同文明背景所催生的生态问题时，难以提出真正具有跨文化适用性的解决方案。此外，他对文化多样性与生态治理之间内在关联的探讨也显得相对薄弱。尽管他强调文化因素在生态救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未能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传统在各自的生态实践中其实蕴含着各不相同且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正因如此，他所构想的文化救赎路径，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批判与价值倡导的层面，面对现实中一系列复杂而具体的生态议题，并未给出足够系统的回应。当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等跨国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时，他的理论框架便暴露出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很难落地为真正有效的实践策略。总体来看，奥康纳的理论贡献不可否认，但其视野上的局限与操作层面的缺失，也使得他的学说在面对全球性生态挑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总的来说，奥康纳的“文化—自然辩证法”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理论方向，但关乎现实问题的忽视和实践路径的缺失，也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而正是这些局限性，凸显了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价值。

二、中国实践：辩证法本土化突破

（一）宇宙观融合：从“天人二分”到“生命共同体”

在哲学发展过程中，人们怎么理解宇宙，会直接影响他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行动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哲学中流行的是“天人二分”的宇宙观。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思维与物质进行严格区分，认为心灵与身体、人与自然是相互独立的实体^[4]。这种二元对立的看法，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兴起时，确实激励了人类去探索和改造自然，也大大推动了科技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正是这种把人与自然割裂开的态度，让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过度开发资源，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生态环境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有很深的“天人合一”思想。早在先秦时期，道家就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认为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融为一体。儒家也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同样看重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6]。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也为当代中国实现辩证法的本土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今天的中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观。这个理念突破了“天人二分”的思维局限，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它既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发展观革命：绿色生产力的辩证生成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其

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为绿色生产力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眼自然内在的统一性^[1]。传统生产力理论把资本增值放在中心位置,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结果导致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绿色生产力理念的诞生,正是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辩证否定,它让生产力理论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从“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在破解自身发展难题,也是对全球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这种理念和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避免走生态破坏老路的新选择,也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了新的动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绿色生产力的辩证生成,是中国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生态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还以一种新的发展范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范式重构：迈向全球生态治理的文化救赎新路径

（一）全球话语权建构：对西方生态乌托邦的超越

西方生态理论长期存在理想与现实割裂的困境。以深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生态乌托邦思想,试图通过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权利优先”来解决生态危机,这种理念在理论层面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实践中却陷入多重悖论。哲学家约翰·巴里(John Barry)指出,西方生态运动常陷入“环境原教旨主义”,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忽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7]。部分西方环保组织倡导全球立即停止化石能源使用,但这种主张完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求,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以生态名义维护自身技术与资源垄断的话语工具。

中国生态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方法

论基础,立足本国实践,实现了对西方生态乌托邦的超越。中国将生态保护上升到文明存续的高度,同时强调生态与民生并重、加快生态产业发展等辩证命题。这种理念既承认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又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生态话语体系的崛起,本质上是对西方生态话语霸权的辩证否定,是对西方生态乌托邦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土化的重要体现。西方长期将生态议题意识形态化,将“碳足迹”“生态现代化”等概念包装成普适标准,实质是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中国通过提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原创性概念,重新定义生态治理的价值标准,将“人民福祉”“代际公平”等东方哲学智慧融入生态话语,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生态治理框架。这种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更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发展。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激活

生态马克思主义很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那种对自然无限索取的生产方式。奥康纳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动态转化和系统的整体性,这为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在生态治理实践中,并没有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而是将普遍原理与本土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治理体系。这种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奥康纳辩证法的原有内涵,也使其在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获得了新的解释力。由此,中国实践的普遍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激活,以及奥康纳辩证法的现实验证与理论升级,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条通往全球生态治理文化救赎的新路径。这条路径的探索过程,也为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如何推进理论本土化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融合,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012.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2]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3] 王增福.“自然”的回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析[J].东岳论丛,2014,35(08):44-50.
- [4]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 [5] 老子.道德经[M].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6]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7] Barry, J. The Politics of Actually Existing Unsustainability: Human Flourishing in a Climate-Changed, Carbon-Constrained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